

宋代高僧思净与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造像遗迹研究*

常青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内容提要: 思净, 俗姓喻, 是杭州佛教史上的著名僧人, 活动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 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冬圆寂, 终年约70岁。他擅长绘画与雕塑, 因喜图绘弥陀像, 被人称作“喻弥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位于杭州宝石山东南麓大石佛院的半身弥勒佛像, 该像雕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左右。大石佛院毁于元至正十九年(1359), 半身弥勒佛像表面也剥损严重。大石佛院在明朝曾重修, 东壁北侧三所圆拱形龕为后代补雕遗迹。大石佛院的半身弥勒像对研究中国弥勒信仰史与半身佛像的雕造史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关键词: 思净 喻弥陀 弥勒佛 大石佛院 杭州

中图分类号: G87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0)03-0069-10

中国古代文人多重绘画而轻雕塑。在传承有序的美术史著作中, 所著录的画家多不胜数, 而善雕塑的名家却寥寥无几。如今, 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雕塑艺术作品, 特别是佛教雕塑, 文献的缺乏给我们研究这些作品的作者及其艺术传承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于是, 文献所载的为数不多的雕塑艺术家及其成就, 成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雕塑史极为珍贵的史料, 特别是仍有作品存世的雕塑家。活跃于北宋末年的僧人思净(喻弥陀)就是其中一位著名人物。笔者拟根据文献记载简述思净的生平, 并就客观迹象、时代风格、艺术传承、宗教表义等几个方面阐述其存世的唯一作品——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的半身弥勒佛像。

对于大石佛院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目前还比较薄弱。1911年, 美国著名工业家、艺术收藏家佛利尔访问杭州, 拍摄了保俶塔下大石佛院的远景。^[1] 1986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一幅大石



图一 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半身弥勒佛像

* 本文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资助。本文图片皆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1] 常青:《物华旧影:1910—1911年佛利尔镜头里的中国文化史迹》,文物出版社2019年,图4-55。

佛院半身弥勒像的照片(图一)^[1],并对照片做了简短的说明。2004年,王玉东在讨论半身佛像图像时探讨了该半身弥勒像的宗教含义。^[2]2012年,陈琿、棕彝考述了大石佛院侧壁的布袋和尚像,并认为此像为北宋初年雕造。^[3]2013年,陈琿、棕彝考述了大石佛院的沿革,并简要论述了的大石佛院的客观迹象。^[4]1992年12月27日,笔者在杭州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杭州临安城址考古发掘工作期间,调查了大石佛院遗迹。^[5]本文所用的客观资料为笔者实地考察所得。

一、僧思净及其文献中记载的艺术作品

僧思净的简要生平见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志磐所撰《佛祖统纪》。该书卷十曰:

法师思净,钱唐喻氏。受法华于瑛师。既悟厥旨,复深研净土之观,专志念佛,日课观经。大观(1107—1110)初,于郡城北关创精舍,扁曰“妙行”,领徒乞食。期饭僧百万,不二十年,竟逾八倍。建十莲华藏,規制巧妙,为天下轮藏之冠。尤精画佛,每运笔,先于静室念佛观想。一日,画丈六像,见佛光良久,众皆瞻礼。师于是时,顿悟笔法之妙。于是人间咸称为“喻弥陀”。尝于西湖北山凿石作弥勒像,露半躯于岩。识者以为深谷为陵之日,必有继成全身如三生石像者。宣和(1119—1125)初,盗起清溪,犯钱唐。师告渠魁,愿以身代一城人命。贼义之,妖锋为戢。绍兴庚申(1140)冬,端坐想佛,七日不废。忽起然香供佛,归座趺坐而化。旬日,顶上温暖,面体红润,见者谓其犹生。葬于法堂之右。^[6]

志磐的记述基本概括了思净一生所做的几件大事:①创建妙行寺饭僧,②擅长画弥陀像,③在西湖北山雕造半身弥勒佛大像,④盗贼作乱之时,愿以一人之命救全城人性命。与志磐基本同时或其后的关于思净的著述极多,但基本都是围绕着这几件大事来叙述其生平与业绩。南宋潜说友(1216—1277)在《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中也明确记载思净“善画弥陀,悟笔法之妙,世号喻弥陀”^[7]。南宋员兴宗(?—1170)《九华集》卷二十有“赞喻弥陀”诗曰:“非真非讹,笔端弥陀。非镌非刻,石上弥勒。昔人方便殊胜门,大似虚空,遗鸟迹,还见么。善财楼阁变虚空,古今待接无穷极。”^[8]诗中特别强调了思净擅绘弥陀,雕造弥勒石像。由上文可知,思净是个艺术僧人,不仅擅画弥陀像,而且还雕造弥勒石像。其著名雕刻作品就是志磐提到的杭州西湖北山的半身弥勒像。

南宋末元初文人牟巘(1227—1311)《牟氏陵阳集》卷九收录的《重修妙行院记》也详细描述了思净的事迹:

杭北关之外,江涨桥至左家桥,有喻弥陀净公接待妙行院。净公早岁喜画弥陀佛,无为子杨次公呼之曰“喻弥陀”,名遂大传。院距喻家桥甚迹,盖以其姓氏其桥也。予异时屡至焉,比不至且久。每记无垢张公所作《宰堵铭》,具言方腊之乱,净公径入贼垒,愿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贼悚,为少戢。夫为善之心,勇猛坚确而本于诚实,是能感通神明。彼盗贼之徒,虽甚悍桀,亦有人心,宁不为之革面改图?惟善之归乎!况推之以造事立业,将无不可为者。净公前后所为,如欲饭百万僧,乃至三百余万。凿西湖多宝山为弥勒像,又增广其居,为殿堂楼观,皆一念之诚,实始而终之。方其画时,坐一净室,禅观寂然,见阿弥陀光明好像,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湖石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图版49。

[2] 王玉东:《半身形像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6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0页。

[3] 陈琿、棕彝:《杭州宝石山大石佛院北宋初布袋和尚写真摩崖造像考》,《人间弥勒》2012年第1期。

[4] 陈琿、棕彝:《杭州古大佛寺弥勒信仰史略及布袋和尚写真像年代再考》,待刊。

[5] 此次调查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李德金和倪亚清的帮助。

[6] 《大正藏》(第49卷),第207a—208b页。

[7] [宋]潜说友原纂修,[清]汪远孙校补:《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陈训正、马瀛等纂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769页。

[8] [宋]员兴宗撰:《九华集》卷二十,[清]纪昀等编校:《钦定四库全书》,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本,第15页。

而后下笔。故所画如所见，凡所建造如其所画也。^[1]

这段记述较前述文献有了更确切的信息：思净所建的妙行寺主要是为了接待云游僧人，“喻弥陀”之名来自杨次公（即侍郎杨杰），思净所遇的盗贼之乱实为“方腊之乱”。

南宋以降的文献中不仅对这尊巨像多有记载，并将其与秦始皇缆船石相联系。例如，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九曰：

秦王缆船石，在钱塘门外，昔秦始皇东游泛海，舡舟于此。陆羽（733—804）《武林山记》云：自钱塘门至秦王缆船石，俗呼西石头。北关僧思净刻大石佛于此。旧传西湖本通海，东至沙河塘，向南一岸皆大江也。故始皇缆舟于此。^[2]

此石据传是秦始皇缆船石，后被思净凿为石佛像。潜说友在其《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中还记载了与半身弥勒像所在地大石佛院相关的宗教场所：

相严院，天福七年（942）钱氏（吴越王钱佐）建。旧为十三间楼石佛院。治平二年（1065）改赐今额。淳祐三年（1243）重建。……大石佛院，陆羽《武林山记》云：自钱塘门至秦皇缆船石，俗名西石头。宣和中僧思净就石凿成大佛半身。^[3]

潜说友在《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中谈到杭州兜率寺时也提到了思净的弥勒像，其文曰：“兜率寺，显德二年（955）钱氏建。宣和初毁，以其地为副将廨舍。有僧思净，俗姓喻……就多宝山斲石为弥勒像。至七年，圣相成，因移请兜率旧额为寺。”^[4]这条记载提供了这尊石雕半身弥勒像的确切年代——宣和七年（1125）。这座兜率寺显然不同于上述相严院，应有不同的创建年代。元代郑元祐（1292—1364）《遂昌杂录》曰：

报叔塔，山脚下有大石，世传秦始皇缆船石。喻弥陀劝人修西方净业，画丈余弥陀，遇堪头行刑日，弥陀张大像，颂佛号，其用勤矣。正凿缆船石为大佛头耳，窍可坐七人，其大可知。东临湖白云宗寺，西则水月园。由山而上则相严寺。寺西石磴直上，则叔宝塔也，下则多宝寺。^[5]

从这条记载来看，这尊半身弥勒像还被人们称作“大佛头”，多宝寺很可能与上述多宝山有关。由此可知，上述文献提到的石弥勒像当指同一尊像。新建成的大石佛院则在当时移请“兜率寺”旧额为其寺名，可见其以崇拜弥勒为主的宗教功能。

元代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二中记述了佛像所在的大石佛院与十三间楼的关系：“大佛头石山后名十三间楼，乃东坡守杭日多游此，今为相严院矣。”^[6]思净雕造半身弥勒像时，那里已有吴越国时建造的一座寺院，在当时称作相严院，很可能以一座十三间楼为主体建筑。思净则在旧十三间楼的南侧就着山崖雕琢了半身弥勒像。因此，在半身弥勒像雕成之后，十三间楼就位于半身弥勒像之后（即北侧），属相严院。

南宋末元初文人周密（1232—1298）所著的《武林旧事》卷五曰：“大石佛院，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俗名‘西石头’。宣和中，僧思净就石凿成大佛半身。或云：下通海眼。”^[7]此记载又提供了关于大佛的一些传说。

[1] [宋] 牟巘：《重修妙行院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1页。

[2] [宋] 施谔撰：《淳祐临安志》，《南宋临安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

[3] [宋] 潜说友原纂修，[清] 汪远孙校补：《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陈训正、马瀛等纂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9号），第768页。

[4] [宋] 潜说友原纂修，[清] 汪远孙校补：《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陈训正、马瀛等纂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9号），第768—769页。

[5] [元] 郑元祐：《遂昌杂录》卷二，刘耀东编：《括苍丛书》（第二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48年影印本，第11—12页。

[6] [元] 吴自牧：《梦粱录》，[清] 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7册），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华文书局1967年，第4219页。

[7] [宋] 周密：《武林旧事》卷五，西湖书社1981年，第83页。

元代文献中还记载了思净的其他艺术作品。元代文人郭昇（1280—1335）曾游览了思净创建的杭州妙行寺，在他的《客杭日记》中记载了寺院当时的情况和一些题材不明的思净绘画作品：

至大元年（1308）戊申九月廿三日客杭……出北关门湖州市妙行寺中……观正殿佛三尊，伟甚。中设毗卢遮那佛像。前殿止有藏一座。次入法堂，有碑石数本，云喻弥陀神笔所画。佛像旁刻本末，不暇记也。次礼古观音像，相传唐朝塑者。两边画壁以屋暗不可细览。门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即此院也。^[1]

元代以后，文人们继续记述思净及其石雕大弥勒像，以及这尊石佛像在宋代以后的情况。元末明初文人陶宗仪（1329—1410）《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曰：

大佛头。宋高宗朝，钱塘喻氏出家为沙门，名思净，建妙行院于北阙，接待供僧三百万，画阿弥陀佛，入于神妙。杨侍郎杰赞为喻弥陀，人从而称之。净又于西湖之北镌石为大佛头，父老相传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缆石。盖是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2]

入明以后，大石佛院有了官赐“大佛禅寺”之名，旧额“兜率寺”就不再使用了。据明代田汝成（1503—1557）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完成的《西湖游览志》卷八记载：

宝石山麓为大佛禅寺、沁雪泉。大石佛，旧传为秦始皇纜船石。宋宣和中，僧思净者，当儿时见之，作念曰：异日出家，当镌此石为佛。及长，为僧妙行寺，遂镌石为半身弥勒像，饰以黄金，构殿覆之，遂名为大石佛院。元至元间，院毁，佛像亦剥落。皇明永乐间，僧志琳重建，敕赐为大佛禅寺。弘治四年（1491），僧永安重修。寺畔有塔，俗称壶瓶塔，乃元时西河僧所建……寺畔，旧有相严院……晋天福二年钱氏建。有十三间楼，楼上贮三才佛一尊。^[3]

此外，汪珂玉（1587—？）于明崇祯六年（1633）撰写的《西子湖拾翠余谈》卷上说：“宋徽宗时，有喻氏子，法名思净，弃俗出家，舍宅以接待云水为妙行，寺在武林门北夹城巷西。思净善塑佛像，人称喻弥陀。”^[4]同书卷下又说：“大石佛院，在宝石山前，相传秦皇纜船于此石。石后有十三楼，宋宣和中，僧思净凿石为佛，饰以金碧，仍构穹殿覆其上，名曰大佛头，寺因以名。至正己亥（1359）毁，佛像亦剥损。宣德（1426—1435）间复创殿庇之。”^[5]

明代吴之鲸《武林梵志》对思净其人有更多的描述，其书卷四曰：

妙行寺，在夹城巷。宋徽宗时，有僧思净者，姓喻，工画佛，人称“喻弥陀”。遂弃家学佛，舍宅为寺，以接待云水。二十年间，往来者三百万众，故俗称接待寺。方腊之乱，思净语贼：“乞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贼为少戢。元季毁。宣德二年（1427）重建。寺南为望佛桥，寺内有布袋和尚像，亲笔题赞，书法道古。张九成喻弥陀塔铭：钱塘喻氏子，生不茹荤。少好画，学吴道子，臻其能。后专画阿弥陀佛。无为子杨次公喜之，呼为“喻弥陀”，世因以称焉。年三十五岁，弃家学佛，名思净。初礼开化，定公为师。次依灵芝，照公祝发。二公皆有戒行，而师所志甚远，不自以为足也。即北城之外僦舍饭僧，期以百万。日持钵乞食，不避寒暑，心念精一，人天归焉。不为经藏，为毗卢大阁，百镜四垂，互相摄入，庄严雄饰，俨若天宫，庖湏井厕，莫不备具。郡移妙行院额，以旌其勤。属方腊、陈通之乱，煨烬之余，妙行岿然独存。盖虽贼，不敢犯也。至金人入寇，始焚之。腊之来也，师径造贼垒，愿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诚心感动，贼悚然，为之少戢。每贼退师，辄收聚遗骸，大作佛事，香花熏沐冢而藏之。其志坚确，表里如一，积久纯熟，不见间断。至于随机响答，自然殊胜。有部使者问师能画弥陀，何不参问？师即答曰：平生只解画弥陀，不解参禅，可奈何。幸有

[1] [元]郭昇：《客杭日记》，[清]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3册），第1233页。

[2]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三编·子部》（第378册），吴潘氏滂意斋藏元刊本，第84页。

[3]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八，[清]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10册），第5968页。

[4] [明]汪珂玉：《西子湖拾翠余谈》（卷上），[清]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8册），第5260页。

[5] [明]汪珂玉：《西子湖拾翠余谈》（卷下），[清]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8册），第5271页。

五湖风月，在太平，何用动干戈。师为儿时，游西湖多宝山，辄作念曰：异时当镌此为佛。其后遂为弥勒之像，欲及百尺，使水陆往来得以瞻仰。门下侍郎薛公问弥勒见在天宫，为诸天说法，公于此镌顽石，将奚以为？师曰：咄哉顽石头，全凭巧匠修。只今弥勒佛，莫待下生求。其他发扬应接往往如是。尝以般若心经句为一颂，其所自得，盖不可以常法论也。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二十四日，跌坐而逝，年七十^[1]。其徒葬于院之法堂之右。前此，僧有梦窳堵坡坠于地者，有梦白龙升天者，有梦众神礼辞者。噫！此岂常人也哉。度弟子二百八十一人。师常以院宇未复为念，既而弟子行超以判府丞相吕公之命，甲乙相继，主院事。行踏建大藏、水陆堂，行速建僧堂二十间，行全建法堂、方丈，巍峨蔽亏，观者动心，其盛矣哉。余钱塘人也，知师为详，窃尝悲学佛者，比比而务实者，何其寡也。学律者，以变古为长。学教者，以好胜为务。学禅者，以破戒为通。其失佛意甚矣。而师惟实是务，不事虚饰，搏空手斋三百万僧，架空地为大刹宇，凿空山为佛，誓以有成，不自有其善，不自矜其能，故人无不信者。兹可尚也。已行全来请铭，铭曰：“大道不明，谁辨西东。卑者眩俗，高者谭空。课其实效，系影捕风。伟哉法师，唯实是务。饭无量僧，建大刹宇。捐躯赎命，指石为佛。厥志未已，厥身已没。誓千百生，终底其成。粤有法子，克肖其父。殿堂楼阁，庖福廊庑。后先出没，为一佛土。咨尔子孙，勿坠其绪。”……张商英（1043—1121）赞喻弥陀画丈六佛诗：“丈六金身毫端，三昧精妙入神。充满法界善知众，艺得大自在。游戏神通一切，无碍恒河沙劫。金刚不坏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史浩喻弥陀偈。搅翻十里西湖水，化作四方八德池。净洗众生烦恼垢，人人见自性阿弥。”^[2]

关于思净所凿大石佛，《武林梵志》卷五曰：

大佛寺，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宋宣和中，僧思净者，当儿时见之，作念曰：异日出家，当镌此石为佛。及长，为僧妙行寺，遂镌石为半身佛像，饰以黄金，构殿覆之，遂名为大石佛院。净即喻弥陀也。元至正间，院毁，佛像亦剥落。永乐间，僧志琳重建，敕赐为大佛禅寺。弘治四年，僧永安重修。^[3]

同书卷十一又曰：“妙行寺，思净，钱唐喻氏，建妙行院，于北关接待供僧三百万，画阿弥陀佛，入于神妙。杨侍郎杰赞为喻弥陀，人从而称之。净于西湖孤山之北镌石为大佛头。绍兴十年十一月七日入寂^[4]。礼部侍郎张九成（1092—1159）铭其塔。”^[5]

田汝成、汪珂玉、吴之鲸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关于半身弥勒像雕成后的信息：在半身弥勒像完工时，曾在表面饰金色，并建造了保护佛像的木构建筑。关于半身弥勒像被毁的年代，田汝成认为是至元年间，汪珂玉与吴之鲸则认为是至正年间。联系杭州大部分寺院都在元至正年间被毁的史实，半身弥勒像及其保护性建筑应被毁于元朝末年。当时，不仅此处佛教胜迹遭到了毁坏，大佛像的表面也剥损严重。明永乐年间重修时，石佛所在地被明廷敕赐为“大佛禅寺”，到明弘治四年还有过一次重修。明宣德年间还有一次重新建造木构大殿以保护这尊大佛的工程。总之，在明朝永乐、宣德、弘治年间重修大石佛院时，很可能用土坯及其他材料修复了佛像，因为在此之前大佛像的表面已剥损严重。

二、大石佛院遗迹及其相关问题

大石佛院位于宝石山东南麓，坐北朝南，面向西湖。该石佛院实为一略呈方形平面的露天摩崖大龛，南北进深18米，东西宽18.1米，正壁高6.8米。由于山坡向南的关系，大龛的东西两侧壁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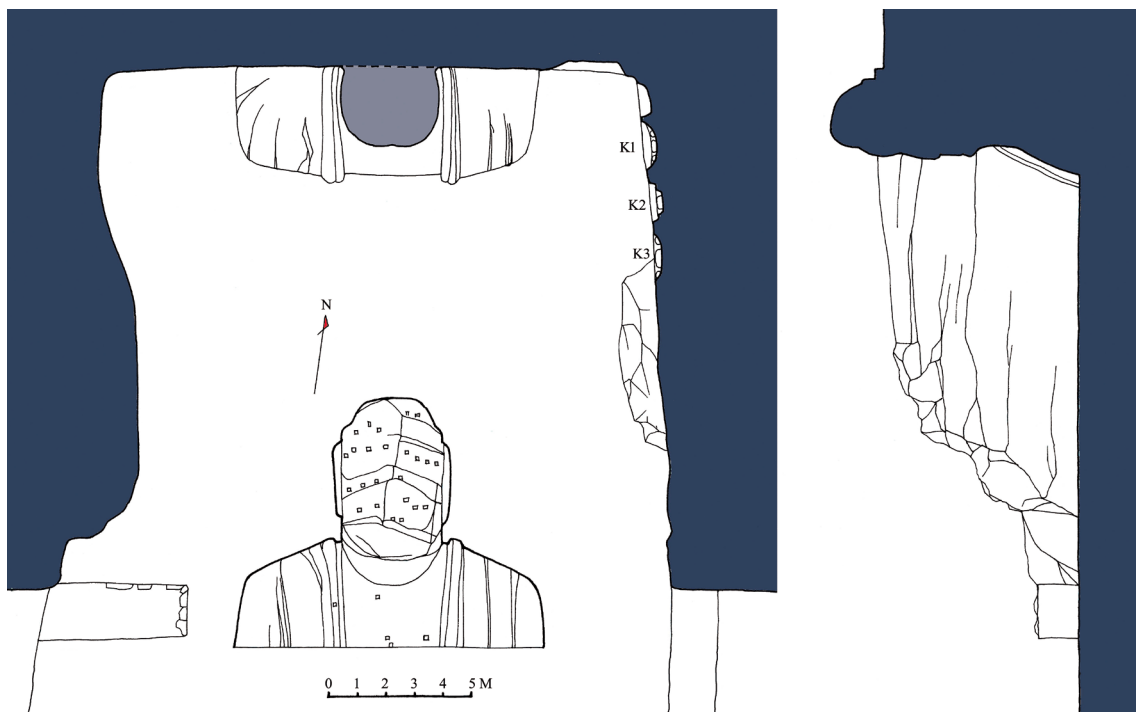
[1] 此处记载思净圆寂年代与《佛祖统纪》的绍兴十年不同。如按此记，思净于1137年圆寂时年70，则其生年应为1067年。

[2] [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四，[清]纪昀等编校：《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一》，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本，第1-5页。

[3] [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五，[清]纪昀等编校：《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一》，第1-3页。

[4] 此处记载的思净圆寂年代与《佛祖统纪》相同，而与同书卷四所记不同。因此，笔者倾向于《佛祖统纪》记载的思净卒年——绍兴十年。

[5] [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十一，[清]纪昀等编校：《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一》，第6页。



图二 大石佛院平面图与半身弥勒像立面



图三 大石佛院半身弥勒像头部残迹

1. 半身弥勒像头部(正面); 2. 半身弥勒像头部残迹(侧面); 3. 半身弥勒像头部(后面)

向南渐矮。现大龕龕口东西两侧有残存的作为大石佛院入口的石砌墙，其中西部的墙体保存较多，宽1.8~2米，残高1.5米(图二)。

大龕正壁雕有一尊半身弥勒像，仅表现佛像的头部与胸部。弥勒像通高8.7米，头高5.5米，肩宽10.5米，胸部厚3.8米，颈宽3.25米，颈厚2.7米。佛头出露正壁1.9米，主要是肉髻部分。佛像面部已残，表面有许多方孔，应为后代(如明代泥塑)修补面部时留下的痕迹。这种方孔在胸前也有一些，应是同期重修时的遗存。从现存迹象观察，原佛头顶部的肉髻呈馒头形，向前突出。佛像面部呈方圆状，双耳长且垂肩。双肩较宽，胸部丰满并略微鼓起。佛像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衣襟在胸前

平行下垂，出露胸部，衣褶雕刻较厚（图三，1、2）。佛头后部凿有一层平直的台阶，也许为古人记载的系挂船缆之用（图三，3）。

这种佛像的样式及风格与杭州飞来峰元代初年依照宋代样式风格雕造的汉式佛像相似，如飞来峰第59龕元至元二十〇年（1285—1292）杨思谅夫妇造西方三圣像中的阿弥陀佛像（图四）、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杨琏真伽造的第98龕中的主尊佛像^[1]，都有类似方圆的面容、丰满的身躯，特别是大衣双领下垂袒裸胸部的特征，都可以在这尊半身佛像的残存部分看到。这些飞来峰佛像可以帮助我们推想大石佛院半身弥勒像的原始面貌。

据上述文献可知，思净雕造的这尊半身大佛像题材为下生弥勒佛像。建造弥勒的传统盛行于中国佛教艺术界，尤其以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为甚，以保存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为数众多的倚坐下生弥勒佛像为代表^[2]。虽建造半身佛像与半身弥勒像并非常见，但也有迹可寻。四川仁寿牛角寨第30号龕雕造于唐代天宝年间，这实际上也是一所露天摩崖大龕，龕内雕一尊半身佛像，仅及胸部，双手于胸前合十（图五）。可以看出，宝石山的半身佛与唐代传统一脉相承，这两尊半身佛像前均有广阔的庭院空间作为集会礼拜的场所。出现半身佛像最多的是开凿于南宋的大足宝顶山石窟（图六）。另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二《南山城内胜迹》还提到了杭州的另一尊宋代半身佛像：

“宝山，东接石佛山。……百法寺，在石龟巷，宋建炎初，僧宝宁建。有大佛半身，依山凿石为之。淳熙十四年（1187）赐额广润。元时改额百法，赵子昂书。元末毁，皇明天顺元年（1457）僧道冲重建。”^[3]我们可大致看到半身佛像在唐宋时期的发展情况。^[4]

大石佛院及其半身大佛像应有特殊的宗教功能。王玉东认为思净所雕半身佛像的题材应为弥陀像，可能是依据南宋末元初杭州诗人董嗣杲赞



图四 杭州飞来峰第59龕杨思谅夫妇造西方三圣像



图五 四川仁寿牛角寨第30号摩崖弥勒半身大像龕



图六 重庆大足宝顶山石窟《观无量寿经变》组雕

[1] 高念华主编：《飞来峰造像》，文物出版社2002年，图版104。

[2] 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雕刻粹编——佛》，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3]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二，[清]纪昀等编校：《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一》，第11页。

[4] 王玉东：《半身形像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6辑），第5-70页。

此大佛头的诗句——“不是金涂丈六仙，庄严法界想西天”。^[1]另外，他认为思净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在钱塘北关建妙行院，接待云水僧人。在宋代，杭州或东南其他地区净土人士造弥陀像、建接待院的事例不在少数，而“建无量寿阁接待云水”，或建云水接待站和弥陀像显然与宋代东南地区的各类净土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王玉东认为这尊西湖大佛头可能原本就是净土接待院内的一个主要设施，大约就是一个“无量寿阁”中的半身弥陀像。^[2]但是，笔者并没有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明确记载思净所雕半身大佛像题材为弥陀之例。董嗣杲诗中提到的“西天”是当时佛教徒的一般信仰，也是最流行的信仰，不一定就是特指大佛头的题材。相反，从上述文献可知，南宋文献指出思净的大佛头题材是弥勒。还有文献记载思净在雕成这身大像之后，还特地将大佛所在场所命名为“兜率寺”。这些史料均将此半身佛像的题材指向弥勒，而不是弥陀。从中国历史上建造大像的传统来看，一般的题材是释迦或弥勒，而明确题为建造弥陀大像的例子则很少见到，特别是唐代以降之例，更以弥勒大像流行。因此，将大石佛院的宗教功能解释为与弥陀崇拜相关的云水接待站，就显得牵强了。另外，即使这身半身佛像的题材是弥陀，它所在的大石佛院是否在当年就一定用作云水接待站，而接待站是否一定要建造一座大像，也仍有讨论的余地。其实，从研究方法来讲，一个僧人的两段经历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特别是与艺术作品相关的经历。对于思净而言，他在妙行寺建立接待站，而在宝石山凿出大佛后不一定也用作接待云水僧了。因此，大石佛院的宗教功能也许很简单，就是为了佛教徒信仰未来弥勒佛国服务的，被一座木构大殿覆盖的半身大佛像前的空间应是为人们礼拜与集会仪式服务的，就像其他地区大佛殿的功能一样。相反，云水接待站的建筑空间应服务于云游僧人的生活，不同于宗教仪式性质的庄严空间。

关于建造半身佛像的艺术与空间意涵，王玉东认为应该是表现“不觉与地相接”和“连山当户”的意境。半身佛像的图像寓意是表现“云中世界”“云中现”，半身应是云雾遮挡的结果。他所指的意涵来自两条文献：其一是洞山良价（807—869）法孙匡化禅师赞许龙牙和尚半身佛像诗：“日出连山，月圆当户。不是无身，不欲全露。”其二是元代文人吾衍（1272—1311）《闲居录》中的一段话：“钱塘僧思净凿湖滨石为大佛头，其前留两石壁，正拥其肩，意在不觉与地相接。”王玉东还认为半身佛像在宋元时期南方禅宗各类祖师像的制作上曾经成为一时风气。^[3]姚崇新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指出半身佛（菩萨）像的做法在大足地区南宋以后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到了明代仍在延续。这种传统上可追溯至仁寿牛角寨的唐代半身佛像。^[4]这些半身佛像出现的时间、空间、语境等方面均有差异，如果都把它们归纳为“云中现”显然是不合适的。王、姚的研究对我们推想大石佛院的半身弥勒像很有启发，但具体含义为何，也不足以定论。

三、大石佛院后代补雕遗迹

在石佛院的东壁偏北处有后代补凿的三所圆拱形龕，现自北向南编为三个龕号，见图二右上方，编号为K1、K2、K3，依次叙述如下。

K1：龕高1.26米，宽1.63米，深0.44米，龕下沿距地面1.4米。龕内雕结跏趺坐佛与二立菩萨像，均残毁不清。主佛高0.55米，可识其丰满的身体，头后有桃形头光残迹。二菩萨像高约0.35米（图七，1）。

[1] 潘志良编著：《西湖赏石》，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2] 王玉东：《半身形像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6辑），第24页。

[3] 王玉东：《半身形像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6辑），第22-23、26-46页。

[4] 姚崇新：《大足地区唐宋时期千手千眼观音造像遗存的初步考察》，《大足学刊》2018年第2辑。



图七 大石佛院后代补雕遗迹

1.K1—佛二菩萨残像龕；2.K2 布袋和尚像龕；3.K3—佛二弟子残像龕

K2: 高 1.13 米, 宽 1.24 米, 深 0.4 米, 龕下沿距地面 1.86 米。内雕布袋和尚像一尊, 高 0.66 米。该像呈正面坐姿, 左腿盘起, 右腿弯曲支撑, 右手下抚右腿膝部, 左手执一布袋置于左大腿上。头呈圆形, 五官宽大, 表情严肃, 两耳宽大。两肩上耸, 腹部鼓起, 双乳微显。该像身披双颌下垂式大衣, 袒胸露腹, 但大衣表面多不刻衣纹, 仅有的少许衣纹也没有写实感。像后有阴刻的圆拱形身光, 高 0.9 米, 宽 0.9 米 (图七, 2)。从总的样式与风格来看, 此像雕技拙劣、粗俗, 与宋代以降的传统布袋和尚像风格明显不同, 后者多表现为欢眉喜笑、身躯胖大, 雕刻技法写实, 如保存在杭州飞来峰第 68 龕中的南宋布袋和尚像与第 45 龕的元代布袋和尚像^[1], 以及现存国内体量最大的福建福清瑞岩山元代末年雕就的布袋和尚像等^[2]。根据该龕下的题记可知, 龕中布袋像为民国十三年 (1924) 六月朱剑之等人造的弥勒佛像, 这应是该龕的纪年^[3]。

K3: 高 1.2 米, 宽 1.46 米, 深 0.2 米, 内雕结跏趺坐佛并二立弟子像, 表面严重毁损 (图七, 3)。佛高 0.85 米, 可辨其原来丰满的身躯。弟子高 0.7 米, 仅可识左胁侍弟子的光头。

上述三龕中的 K1 与 K3 毁损严重, 被毁的时间或许与大佛被毁的时间相同。如此推测成立, 此二龕的雕造时间或可至南宋或元代。

东壁南侧有一摩崖碑刻, 上刻“古石佛院”四字, 其南侧刻题记曰“监察御史施儒书 / 正德辛巳秋仲”^[4]。正德辛巳为明正德十六年 (1521)。

结 语

思净于杭州妙行寺出家为僧, 建云水接待站。他擅长绘画与雕塑, 其最著名作品是位于杭州宝石山东南麓大石佛院的半身弥勒佛大像, 其所在地当时被人们称为“大石佛院”, 但正式名称则是以思净移请的北宋御赐的“兜率寺”匾额命名, 并借此与半身弥勒像的题材相呼应。大石佛院的北部为吴

[1] 常青:《本土化的信仰与图相: 飞来峰第 68 龕的布袋弥勒与十八罗汉造像》, 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国古代佛塔地宫文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书店 2015 年, 第 34-59 页; 谢继胜、熊文彬、廖旻等:《江南藏传佛教艺术》,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年, 第 228-232 页。

[2] 常青:《福清市瑞岩山布袋和尚像之信仰与图相源流》,《福建文博》2014 年第 4 期。

[3] 陈琿、棕彝认为该龕题记不足以说明龕内造像的年代, 因为他们认为这尊布袋和尚像有着明显的宋代特征, 但事实并非如此。陈琿、棕彝:《杭州古大佛寺弥勒信仰史略及布袋和尚写真像年代再考》, 待刊。

[4] 关于施儒,《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曰:“黜监察御史施儒为民。儒巡按应天府, 尝出城, 守门军人请职衔以报守备衙门。儒怒其轻已, 执治之。军人因诬服守门, 私骗人财, 发外卫充军。于是守备太监黄伟、魏国公徐俯等不能平, 奏儒擅作威福, 并及其初至时不先谒孝陵枉道还家等事, 命锦衣卫执儒至京。掠讯儒, 具服罪, 法司拟故入人罪, 律贓杖还职, 诏特黜为民。”胡丹辑考:《明代宦官史料长编》(中册), 凤凰出版社 2014 年, 第 1279 页。

越国建造的相严院旧址，曾有十三间楼。大石佛院毁于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石像表面剥损严重。明永乐年间，大石佛院被重修，并被赐名“大佛禅寺”。此后在明代宣德、弘治年间也曾有过重修，重修的痕迹表现为在佛像面部与身体部位凿孔、插木桩、缚麻绳以涂泥塑，也曾重建保护性木构建筑。值笔者调查时，佛像表面明代重修的痕迹和重建的保护性木构建筑已不存，仅留存诸多修复用的石孔。东壁北侧的三所后代补凿的小龕有二龕已完全毁损，毁损的时间或许与大佛在元代末年被毁同时，则其雕造年代或可早至南宋或元代。位于中部的第2龕保存完整，为民国十三年雕成的布袋和尚像。大石佛院的半身弥勒佛像对研究中国弥勒信仰史与半身佛像的雕造史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责任编辑：陈曦）

A Study on Sijing, an Eminent Monk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Statue Relic at the Dashi Buddhist Temple in Baoshi Mountain of Hangzhou

Chang Qing

Abstract: Sijing, with the secular surname Yu, was a famous monk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Hangzhou. He was active from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passed away in winter in the 10th year of Shaox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40 A. D.) approximately at the age of 70. He was good at painting and sculpting, and was known as “Yu Mituo”, because he liked to draw the image of Maitreya. His most famous work was the bust of Maitreya at the Dashi Buddhist Temple in the southeast of Baoshi Mountain in Hangzhou, which was carved around the 7th year of Xuanh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125 A. D.). The Dashi Buddhist Temple was destroyed in the 19th year of Zhizheng in the Yuan dynasty (1359 A. D.), and the surface of the Buddha statue was also severely damaged. The temple was rebuilt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ree small niches were carved on the north side of its east wall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The bust of Maitreya in the Dashi Buddhist Temple has important value both on historical and artistic level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Maitreya faith and bust carving in China.

Keywords: Sijing, Yu Mituo, Maitreya, Dashi Buddhist Temple, Hangzhou